

《日晷》： 超验主义的一场文学盛宴

□杨靖

1842年3月，玛格丽特·富勒决定不再担任《日晷》杂志的编辑，并写信将这一决定告知爱默生。在这一时期的日记中，爱默生反复诘问自己：这份刊物是让它继续生存，还是毁灭？后来在给富勒的回信中爱默生说：“就让我们轮流殉难吧。”他亲自担任主编，从幕后走到台前。

富勒的离职很大程度上是身体的原因。用她自己的话说，是“心力交瘁”。她自幼体弱，父亲对她学业的苛责弄得她神经衰弱；担当编辑两年，耗费精力无数，报酬却分文未得，只能依靠“谈话”讲座维持生活。这些都是她的难言之隐。另外，由于与爱默生等人的编辑理念不完全一致，眼看杂志销量下滑，经营惨淡，她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辞职后不久，她接受格里利邀约，担任《纽约论坛报》编辑兼记者，继续宣传她的男女平权和社会改造思想，抨击社会阴暗面，产生了很大社会影响，被誉为“纽约的公共良知”。

早在1836年“赫奇的俱乐部”（即超验主义俱乐部）成员最初在哈佛（坎布里奇）集会之时，就提出了创办一份杂志的构想：因为在当时的新英格兰，即使最为开明的基督教刊物，对超验派的宗教改革思想也难以接受；而另一些内容浅显的妇女杂志和感伤文学杂志又不合他们的胃口。1839年，当波士顿销量最广的大众杂志《波士顿季刊》主编布朗森向爱默生等人约稿时，为了不被同化，爱默生、里普利、富勒、奥尔科特等人决定创办“超验主义的喉舌”——《日晷》，其名称寓意着一种全新的生活状态和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

杂志的编辑人选，一开始众人推举爱默生。但刚刚以《论自然》一书震动思想界和学术界的大作家正致力于《随笔集》的创作，分身乏术。他推荐富勒出任主编，并提名里普利担任商务经理。而他除了撰稿，也帮助富勒编辑审稿，并负责联系出版商，拉赞助，俨然今日杂志社的社长。

1840年7月，《日晷》第一期面世。卷首是爱默生的“告读者书”：“在新英格兰，旧的宗教习俗和教育传统将人固化为石头”，一派死气沉沉，没有文学天才，也没有批评家，“让人看不到希望，让年轻人失去了梦想”。他主张唤醒一群思想上的反叛者，以崭新的文学样式来反映时代精神，通过严肃而审慎的文艺批评来提高文学的品位，以高雅的诗歌来克服庸常的生活，进而达到完满的道德精神。“僵化的形式——任何形式，都可能意味着精神的死亡。”而他倡导的思想变革，正是对社会习俗的反叛和对保守势力的抵抗。根据他的超验主义学说，欲改造社会，必先改善人自身。

尽管编者宣称这是一本“文学、哲学与宗教”杂志，但杂志的文学性似乎稍稍逊色。远在英国的卡莱尔收到爱默生寄赠的第一卷后，对此提出了意见：一方面他声称这些来自美国的最年轻的声音，纯洁而微妙，令人振奋；另一方面又无遗憾地指出，这类文章的思辨性、理论性太强，令人难以接受。爱默生诚恳地道歉，声称自己也不满意，并希望随后的几期稿件质量会有所改进。

与来自国外的温和批评相比，国内同行和读者的批评口吻要严厉得多，尤其是针对奥尔科特的散文诗《俄罗斯箴言》——玄之又玄，晦涩难解，其风格有如“十五节沉重的车厢拖拽着一名旅客”，单调而乏味。面对这些批评，爱默生显示出他执着而坚定的一面：他坚信自己的眼光和判断。奥尔科特是一位天才，其思想的卓越不凡之处尽管受其文字拖累，却不能被完全掩盖。他对《箴言》进行大幅删改，并且坚持在后几期中继续刊发，完全不顾富勒等人的反对。

富勒和奥尔科特也是好友，曾在“神庙学校”共事。她对奥尔科特的精妙口才推崇不已，但对于他的过于雕琢华丽的写作风格却不太欣赏。她数次拒绝由爱默生寄送的修改稿，对完全脱离市场和读者的杂志的前途深表担心。

同样受挫的还有爱默生的“门徒”梭罗。这位刚从哈佛学院毕业的年轻人雄心勃勃，立志要当一名作家。但他描写康科德地区自然景观的散文，却因为缺乏明确的主题而遭到富勒拒绝。在第一卷中，她只选用了梭罗的一首短诗《同情》和一篇随笔《佩尔西尔》。

困扰富勒和爱默生的最大问题是稿件的匮乏。不得已，他只能选择刊发其家族成员的作品来填充版面，其中包括他已故的妻子爱伦和他的兄弟爱德华的诗篇，以及他的另一位兄弟查尔斯的《一名学者笔记的注释》。后来他的姑母玛丽以及查尔斯的未婚妻伊丽莎白·霍尔的一些文章和诗歌也陆续刊出。有评论家不无嘲讽地将《日晷》称为“爱默生的家庭相册”，显然没能体会到这位主编的苦笑。

当然，这份被称为“年轻美国的无畏圣经”的文学杂志在第一卷中也不乏负盛望出了一些好文章，如富勒关于保罗·里希特和奥尔科特哲学思想的评论，以及巴克和格兰奇的原创性作品。关于欧洲大陆的文学思潮，一般杂志更多只是介绍性文章，至于深入的研究和评论，则是《日晷》的独特贡献。在这方面，作为编辑的爱

默生和富勒意见高度一致。三个月后，《日晷》第二卷出版。虽然撰稿人没有什么变化，但文字风格大有改进。一贯挑剔的卡莱尔宣称对这一卷的喜欢程度明显超过第一卷。尤其是爱默生亲自撰写的关于文学的论文，被称为“迄今为止最有价值的一篇”。在这篇名为《新诗艺》的论文中，爱默生倡导“一种受到激发的心灵的即兴创作”：诗歌应当自心底自然流淌而非源自外部市场。对于艺术家而言，真诚胜过词藻，内容重于形式。真正的天才如浑金璞玉，形式上未必尽善尽美，但惟其质朴率真，才更具心灵的震撼力。

两年来，由于富勒的不懈努力，杂志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成功：梭罗的风格趋于凝练深邃；霍桑的随笔可读性很强；帕克的宗教和神学论文篇幅较长，但气度恢弘，堪称杂志的脊梁。与此同时，富勒还进一步拓宽了稿源，增加了话题的覆盖面。但市场的问题依然无法解决。

当爱默生继任杂志编辑时，他将这一决定称为“小小的文学爱国主义”——纯粹出于对文学的热爱而非名利的考虑。相对动辄数百人、报酬颇丰的巡回演讲，杂志的影响力太小，订户只有区区数百人。出版商小布朗公司也刚刚宣布破产。收缴的定金仅能支付纸张刷费用，编者以及作者都只能是“义务劳动”。这样一份没有市场的小众刊物想要生存，其艰难程度可以想象。

爱默生决定迎难而上。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他为此投入了三分之一甚至过半的文学精力，“只是不忍心眼睁睁看着它停刊”。他的第一个举措是更换出版商。将杂志发行交给富于才情而且乐于助人的皮博迪小姐。她在波士顿经营着当地最大的一家外文书店（二楼则是富勒举办“谈话”的场所），并拥有自己的印刷厂。

作为超验主义俱乐部的一员，皮博迪小姐在欣然领命的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对爱默生在排版、装帧及印刷方面的一些改进意见，她总是无条件地接受，不计成本与盈亏。比如说刊



玛格丽特·富勒

载诗歌，爱默生要求加大行距，留出空白，以便于阅读，但纸张的成本也由此增加。为了刊物的厚重典雅，他又要求更换普通印刷纸张，改用精装本。此外，出于对稿件质量的严格要求，他还时常在开印前一天提出修改意见——临时撤换不仅浪费时间，也大幅增加了成本支出。对此皮博迪小姐无怨无悔：作为同道中人，他们本是为了同一个理想在奋斗。这也是当时超验主义者共同的目标。

值得一提的是，在编辑方针方面，爱默生和富勒的观点也不尽相同。除了文学，富勒对音乐、美术、建筑、雕塑等艺术样式饶有兴趣；爱默生则相反，他自称为“音盲”，对美术也一窍不通。罗马典雅的建筑在他眼里跟波士顿没什么两样。他重视的是自然与科学。前者在他看来是心灵的外化，与人类情感道德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的对应；后者则是人类经验和智慧的总结。此外，他更注重杂志的信息交流功能：国外的某一种文艺理论，国内的某一种学术批评，甚至某人关于社会改革的演讲，都能在杂志上获得一席之地。他邀请梭罗担任助理编辑，两人合作推出旨在介绍世界上主要宗教教义的经文节选：《道德经典》，其内容包括佛教、印度教、波斯教及中国儒家的思想。这也反映出爱默生一贯的主张：古老的经典中往往蕴含着最新的思想。

按照爱默生的理解，新兴的美国文学并非欧洲传统意义上的纯文学，而是宽泛的文学，包括日记、书信、演讲、回忆录甚至格言。《日晷》杂志刊载的这篇文章虽然题材各异，却都是作者思想和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爱默生认为，大凡与人的道德思想密切相关的社会活动内容都可以纳入文学的范畴。比如在他就任主编后的第二期上就发表了布里斯班关于傅立叶空想社会主义的文章，梭罗的《马萨诸塞自然史》，以及他本人关于马萨诸塞农业的文章。甚至还有一篇社论敦促哈佛大学不应该再管学生住宿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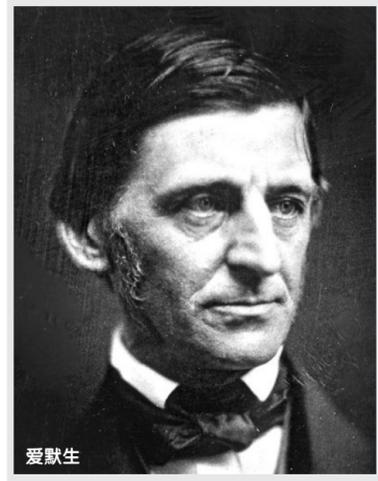
情，而应把重点放到教学上。这些文章就其内容本身而言可能较为精彩，但在廉价的伤感小说大行其道的年代，读者的感受如何似乎是编者未曾考虑之事。

爱默生相信，这些文章相对于想象性的文学创作（如小说）无疑更贴近生活，更能表现人的真实生活状态，因此在他的杂志上几乎从未刊登过任何包含情节的故事，更不用说虚构性的小说。然而作为一份文学刊物，单凭高深的思想性和理论性显然难以吸引读者。

尽管爱默生交游广泛，但当初困扰富勒的稿件来源问题依然令他头痛不已。他写信给远在外地的富勒；他敦促纽康和梭罗（并因后者的慵懒而感到愤怒）；劝说斯特吉斯姐妹写诗；约卡莱尔撰稿；并亲自撰文为年轻的诗人钱宁喝彩。此外，他还采纳帕克的建议：要是一份杂志获得成功，编辑自己应该多写些东西——除了出版他的演讲稿如《时代》《超验主义者》《年轻



《日晷》



爱默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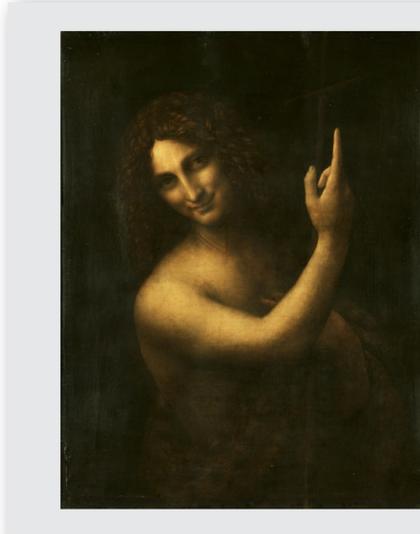
的美国人》，他还撰写了许多关于英国政治家、改革家以及文化名人（如卡莱尔《今与昔》）的介绍和评论文章。根据约尔·迈克尔森统计，他对杂志贡献的76篇稿件中，53篇是在他就任编辑的后两年中所作。身兼编辑与撰稿人双重身份，他一直在苦苦支撑，并以个人的钱财资助杂志续命。

然而爱默生的努力并未能挽救杂志的命运。作为一流的撰稿人，他在杂志上发表的诗文达到了很高的水准；作为尽责的编辑，他删改天才诗人维里的诗作，挖掘出梭罗的潜质，并将奥尔科特从凌乱冗长的文稿中拯救出来。但当超验主义学说的影响衰微，废奴运动和男女平权运动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当“乱涂乱画的女作家”荣登（并长期雄踞）畅销书榜首之时，这份以自我教化和培养高雅趣旨为己任的文学杂志前景也就日益黯淡。到1844年4月，订户只剩下不足200名。杂志终于被迫宣告停刊。

在将近四年的时间里，《日晷》发表42位作者共350篇作品，由此它也成为超验主义运动保存完好的一部档案，因为若干作者迄今已湮没无闻。当然其中也不乏爱默生的《新诗艺》《马萨诸塞自然史》以及富勒《伟大的诉讼》（即《19世纪妇女》）这样的名篇。这是《日晷》在美国文学思想史上的重要贡献。

作为一个文学刊物，《日晷》的失败主要在于它脱离大众，只为少数文学文化精英服务。与此同时，这一场超验主义的文学盛宴虽然以失败告终，它却向人们展示出探索人类精神世界的一种可能性。它向世人表明，社会风尚并非一成不变，文学思想和观念也应该与时俱进。用爱默生在《日晷》“告读者书”中的话说，“僵化保守的陈规陋习必须加以摒弃，只有不断革新才能造就时代的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的超验主义并不单单是浪漫的文学思潮，更是影响深远的新思想新文化运动。

天涯异草



《蒙娜丽莎》

「列奥纳多·达·芬奇」 名垂千古！

□沈大力

今年初春，从法兰西卢瓦尔河谷的昂布瓦兹古堡传出“达·芬奇五百年祭”的佳音：《列奥纳多·达·芬奇名垂千古》。2019整年里，法国将要开展全方位追念欧洲文艺复兴巨匠的文学、艺术和科技活动，内容丰富异常。且看，在卢浮宫展出达·芬奇素描和手稿之后，他晚年的故居克洛·吕塞堡林苑里已悬挂出特大《蒙娜丽莎》画幅，附近的昂布瓦兹堡也铺开《达·芬奇寿终》多彩画布，与光彩四射的夏特勒大教堂的耀眼光影门交相辉映，凸显大师终生渴求“乌托邦”这一达·芬奇纪念年的主题。

同时，今岁也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500周年。“达·芬奇年”实际上是文艺复兴年，旨在突出达·芬奇的人文主义精神及其所起的巨大作用，在更广泛、更深入的层次光耀欧洲思想文化这一重要发展时期，掀起一场新文化思潮。要重新认识宇宙，尤其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而推出文化基础的非物质性概念，与信息纪元摩登时代的纯物质主义相抗衡。

列奥纳多·达·芬奇于1452年4月15日出生在意大利托斯卡纳地区阿勒巴诺山麓的芬奇小镇，生母卡特丽娜一贫贱农妇，生父彼特罗另娶一位与其公证人家庭门当户对的贵族女子，致使他少失怙恃，只得寄情山水，成为大自然之子。1469年，达·芬奇跟波提切利同在佛罗伦萨名师维罗齐奥的画坊学徒。他欲悟彻沧桑之深，挥笔画出一条貌似蝙蝠的龙蛇，显示宇宙生灵玄奥，初露在艺坛探求神奇境界的想法。《圣·热罗姆》《三王瞻礼》和《圣母领报瞻礼》，就是他这一心愿在风华正茂时的体现。1498年，他在米兰为玛利亚美惠修道院绘出大型壁画《最后的晚餐》，引起众人一片赞叹。这一期间，他的杰作还有按合同为“无玷始胎”善会祭坛完成的《岩洞圣母》，描绘圣母日暮在巉岩间呵护圣婴耶稣及其孩提友伴圣约翰，神秘天使在一侧，恬静温馨。此画居然有真假难辨的两幅，情景几乎完全相同；其一现存卢浮宫，与《蒙娜丽莎》和《圣约翰》为邻，另一幅远在英伦三岛的“国家画廊”。在伦敦的一幅，光线比较黯淡，画上天使没有手指天真烂漫的圣约翰。

在达·芬奇1506—1513年间创作的木板油画《圣母、圣婴耶稣和圣安娜》上，原稿里长大为耶稣在约旦河施洗的婴孩小约翰由羔羊替代，象征耶稣日后受难。达·芬奇的美术作品大多散失，至今犹存的真品仅13幅，5幅归卢浮宫，其中最著名的当数卢浮宫镇馆之宝《蒙娜丽莎》，历来被奉为世界绘画艺术的巅峰。

卢浮宫珍藏的这幅达·芬奇作品，法文名称为“La Joconde”，与意大利文题名一致，意为“乔贡德之妻”。此题出自佛罗伦萨画家乔尔乔·瓦萨里1550年撰写的意大利《艺苑名人列传》，瓦氏声称，达·芬奇受富商乔贡德之托，为其妻蒙娜丽莎绘像。然而，罗马历史学家罗伯特·德·扎普利断言：“瓦萨里的说法纯属虚构。此翁从未亲见过那幅画，所谈皆道听途说，不足为凭”。德·扎普利经严格考证肯定：卢浮宫现存的那幅《蒙娜丽莎》根本不是乔贡德之妻。据此，笔者在塞纳河畔旧书摊淘到了瓦萨里的《艺苑名人列传》。瓦萨里在该书第八章记述达·芬奇应乔贡德之请为其妻绘了一幅肖像：“列奥纳多极其微妙地绘出了她面庞的细部，眼睛闪烁光泽，含蕴人显见的滋润，栩栩如生。眼圈淡红，惟妙惟肖，睫毛纤细，浓眉清晰，潋滟透迤，透于玉肌，浑然天成……”可是，到卢浮宫细审该画幅，人们却发现彼姝面庞上没有丝毫眼睫毛和眉宇的形迹，与瓦萨里书中描述的“弯弯浓眉”和“纤细睫毛”全然不符合。另外，德·贝亚蒂斯教士曾陪同阿拉贡主教拜访达·芬奇，见到过这幅肖像，东道主口说那是他为友人朱利安·德·美狄奇之子伊波里多画的一幅“慈母像”。此情节有贝亚蒂斯的笔录为证，足见瓦萨里的说法纯属杜撰，不攻自破。看来，卢浮宫的达·芬奇杰作《蒙娜丽莎》应斩其枝了。

德国汉堡艺术史家亚历山大·贝里格从事一系列调研，认定现存卢浮宫的《蒙娜丽莎》正是朱利安·德·美狄奇让达·芬奇为其子伊波里多画的那幅肖像。伊波里多的母亲是贵族女子帕希露卡·布朗蒂尼，遭人强奸受孕，生下一子后患产褥热死去。伊波里多幼年丧母，达·芬奇为他画出理想的慈母肖像，慰藉一颗破碎的心。据传，达·芬奇的母亲也有跟帕希露卡类似的悲惨命运，在作画时寄托了自己对母亲的怀念，让人朝子露出慈母的微笑。故而，现存卢浮宫的名画《蒙娜丽莎》恰切的名称应为《帕希露卡·布朗蒂尼》，或曰《慈母的微笑》。至于瓦萨里所说的那幅《蒙娜丽莎》，达·芬奇弟子萨拉伊在他的遗产名录里确曾提及，是师傅到巴黎前夕托付给他保存的。萨拉伊不知所终，该画幅也就杳无影踪了。

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笔者两度造访昂布瓦兹附近阿玛斯河谷中的克洛·吕塞堡，即达·芬奇晚年应法王弗朗索瓦一世之请，旅居法国的故居。这里展出达·芬奇生前一直居住在身边的《圣安娜》《圣约翰》和法国人一般所称的《乔贡德之妻》肖像，均为高精度的复本。名画永无止境的艺术追求，让参观者仿佛听见先贤的训迪：“不断向更遥远的境界探索！”还有《达·芬奇笔记》，汇集了他数千份实验自然科学手稿，预见性地广泛论述天文物理、光学、数学、化学、生物物理学理论，闪烁着人类智慧之光，堪为探索宇宙的宝库。达·芬奇曾留下一则寓言《扑灯蛾》，生动描绘一只小飞蛾在黑夜中扑向灯火焰心被灼伤，猝死在地上；此乃奋不顾身、热烈追求光明的具象。

在纪念达·芬奇逝世500周年之际，人们正是遵循他的教喻，开拓对宇宙玄奥的探索。为此目的，在卢瓦尔中央区主席弗朗索瓦·波诺主持下，法国在2017年10月2日成立了“纪念文艺复兴五百周年”指导委员会，召集相关机构和多方专业人士，进行了一系列筹备工作。他们决定于今年7月1日由法国、意大利和德国联合举办一届“踏列奥纳多足迹千里行”的活动。全球有志者，包括莫斯科的旅行者，都汇聚在亚平宁半岛，集结从托斯卡纳的芬奇镇大师的家门前徒步，或骑自行车出发，用5个昼夜重踏500年前达·芬奇从意大利越过卢瓦尔河谷中央昂布瓦兹的行程。参加者越过意大利北部都灵市、从阿尔卑斯山穿过通往里昂海拔2083米的切尼斯山口。进入法国境内后，一支由18名法国运动员、8位意大利和6位德国选手组成的团队带领众人向萨瓦、布雷斯特、勃艮第和摩利旺等地区以及蒙塔基区的阿米伊镇进发。届时，阿米伊镇举行“欧罗巴节”，特邀达·芬奇故乡的贵宾莅临。终极目的地自然是达·芬奇辞世的克洛·吕塞堡。

“列奥纳多·达·芬奇年”是一次盛大的民众节日，旨在追怀世界名人达·芬奇和由他从意大利带到法国，遍及整个西欧的文艺复兴运动。历史上，卢瓦尔河谷从中世纪到17世纪都是法兰西的花园。伊拉斯谟、拉伯雷、泰奥多尔·拜兹、加尔文、纪尧姆·布岱和安德烈·阿尔卡特等著名思想家都曾在此播种人文主义。其时，托马斯·莫尔倡导自由思想的“乌托邦”，丰饶了人们的创新天地。意大利建筑师伯鲁涅利斯基以文艺复兴思潮为基础的新颖艺术风格，也乘势涌入法兰西大地，冲击象征神权的传统哥特式建筑模式，推崇佛罗伦萨以穹窿为中心的城堡道院形体。

达·芬奇的到来，更使卢瓦尔河谷变成了文艺复兴的摇篮。沿着这条河，遍布阿泽勒利朵堡、瓦朗塞堡、舍农索堡、布鲁瓦堡，尤其是堪与北京故宫媲美的尚博堡等古堡群，皆为法兰西八世和弗朗索瓦一世治下西南欧的文化胜迹和艺术景观。于2000年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驰名遐迩的尚博堡就是达·芬奇参与设计的。达·芬奇逝世时，尚博堡开始动工建筑，至今整整500年，故被纳入现今的“达·芬奇年”一同庆祝。核心是继承欧洲文艺复兴的遗产和人文主义精神。

弗朗索瓦·波诺表示，要通过外交途径在国际范围内不懈努力，将“达·芬奇年”的活动从法国扩展到欧洲，乃至全球，帮助人们以新的眼光回顾历史上以达·芬奇为象征的文艺复兴各个方面，创造丰富人类未来的精神文化生活方式。为此，当局动员了卢瓦尔河谷500多个地方机构，包括尚博堡和夏特勒大教堂，从3月到10月将组织700项展览、音乐会、体育竞技、参观名胜古迹、放水上焰火，以及开展国际建筑交流等开放型大众文化活动。在他看来，这些活动均以达·芬奇精神为红线。因为，这位文艺复兴思想巨匠的探索，包罗了从艺术探求到科学技术万象，能启迪360度的学术研究。卢瓦尔河谷地区外事顾问斯塔尼斯拉·彼埃尔评论说：“纪念文艺复兴500年是一个极其美好的文化季候，有助于构建未来，我对规划的高水平系列活动印象尤为深刻，冀其能促进国际规模的交流。”克洛·吕塞堡总干事卡特丽娜·西蒙-玛丽宏归结道：“列奥纳多·达·芬奇是一个象征，能聚合所有国家，各个不同代人一起来交流思想。到今年9月份，我们将以化境为这位意大利画家兼建筑学家开辟新的天地，让人们沉浸于他的绘画中。”

远在1800年，拿破仑一世雄才勃勃，在登上皇帝宝座前曾企图将达·芬奇的绘画放置到土伊勒里宫他的寝室内独占，但未得逞。今朝，尚博堡总管理让-路易·苏洛和对外联络办公室主任赛·德·圣沃南表达他们对举办“达·芬奇年”的共同心愿，企盼这场特大规模纪念活动能够波及伊比利亚半岛、英、美、巴西，乃至中国和日、韩等亚洲地区，让世界文化巨匠达·芬奇的精神在全球永垂不朽。